

## 一个青年工作者的回忆

○ 王 汭（1950届航空）

我今年91岁，回想一生，和青年工作有缘。刚解放，我参加工作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在母校清华大学筹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并被选为第一任团委书记。半年后，调到北京团市委，做过大学、宣传、团校、青工等工作，一干就是13年。1962年跟着原团市委书记杨伯箴同志调到北京师院附中（现名首都师大附中），干了16年，一大半时间靠边站，但也是天天和青少年中学生打交道。

1978年调到北京工业大学，做青年大学生的工作。1992年从校长岗位退下，第二年又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干了七、八两届共10年。分在教育界组，并参加教科文卫专门委员会工作，仍然为与青少年密切相关的教育工作建言献策。所以，我自称为“青年工作者”，大概还靠谱。

今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是亲爱的祖国建国70周年，也是北京团市委和校团委团组织成立70周年。回顾过去，心潮澎湃，风风雨雨的一幕幕在脑海飘过。不禁执笔草拟此文，以作纪念。

### 我是怎样参加革命的

日军轰炸激起我的爱国情怀和学习航空愿望。

我于1928年生于兰州，上小学时赶上抗日战争。兰州虽然是大后方，但它是苏联援华的重要通道，因此成为日军轰炸的重点。小学四年级时，我上的甘肃省第一

实验小学就被全部炸毁，只好搬到黄河铁桥边上北塔山顶的庙里上学。当时我家搬到郊区小西湖，我每天要走十几里路爬到山上去上学。

开始日本轰炸机来，苏联和我们的战斗机还去打，后来日本制造了零式战斗机，苏联和我们的飞机就只能躲着走。黄河铁桥是日机轰炸的重点，在日机俯冲轰炸时，北塔山上的高炮连打下了几架。我很佩服并常去高射炮连玩，对日机恨得咬牙切齿，决心长大了要学航空，我订了航空杂志，很佩服高志航等英雄。

1944年，我在甘院附中读高中一年级，国民党政府号召学生参加远征军，说先去印度受美军培训，然后打日本。我率先报了名，但我的父母坚决不许我去，我说没脸在兰州念书，就去了昆明我伯家。由于已过了开学时间，我自学半年，在1945年插班进了云大附中高二。

云大附中是云南民主人士杨春洲创办的学校，楚图南、光未然、赵丰都曾在该校任教，师资大部分是西南联大的青年教师或研究生兼职。学校已有地下党组织，营火晚会上演过《兄妹开荒》。我班的公民课是谭元堃同志（解放后在北京市委工作）教，他已是地下党员，经常给我们分析形势，



扫描二维码，  
将看到与本文相  
关的图片

揭发国民党的腐败和反人民行径。我在西南联大有兰州来的同学，常去他们那里听张奚若、闻一多等进步教授演讲。

“一二·一”运动我们全校也参加了，闻一多被刺，我也在昆明。

本来在兰州时，我完全把国民党当正统，还参加了“三青团”。到昆明后，我的思想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认识了国民党的反动面目，对共产党虽仍不了解，但已有好感。

1946年，西南联大解散，清华、北大、南开在平津复学。第一次全国招生，我和几位同学抱着试一试思想，高二就以“同等学力”参加高考，没想到我考上了清华。考上清华是很幸运的事，清华有公费留学，我的家人都希望我好好念书，争取去美国留学，因此，进校后就埋头读书。

但是，国内战事一天天激烈，再也无法“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尤其是圣诞节前夜，美军强奸北大女同学引起轰轰烈烈的抗暴学生运动，使我再也忍不下去。经同学介绍，我参加了“大家唱”歌咏队，参加了“五二〇”反内战、反饥饿运动。由于表现进步，程法毅老大哥介绍我和黄庆华参加了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

我参加民青后接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创办识字班和医疗队，我和杨家福、吴时生组成民青小组负责此事。清华周围农村有很多失学儿童，没钱上学。我们争取“学生公社”提供经费，自编、油印教材，把小黑板挂在树上，露天为孩子们上课。我们在校内出大字报，号召同学报名当教师，报名很踊跃。从1947年暑假开办到1948年秋被迫结束，先后有500多位同

学参加这项工作。识字班由三个学区扩大到八个学区，学生由不到百人扩大到400多人。

我们还发现农民没钱看病，缺医少药，就组织了医疗队，以生物系同学为主，先后有100多人参加。通过募捐购置了常用药品、器械和药箱，为农民看病1500多人，为识字班学生和家种牛痘1000多人。

这两项活动拉近了农民和学生的距离，农民说：保甲长说园子里的学生都是“共匪”，不让我们接近。看来你们才是好人！“八一九”国民党派军警特务包围各大学，要进校抓进步同学。他们还迫使农民包围清华园，但农民都同情清华同学，睁一眼闭一眼，我们有些地下党员就是在他们眼皮下翻墙去解放区的。更重要的是，现实教育了这些“教师”们，他们真正看到了农民在国民党统治下的悲惨命运，更坚定了革命的信念。我曾写了一篇《走向工农的第一步》，记载这件事。

这时期我除了重点搞识字班外，还参加“大家唱”歌咏队、“紫藤团契”等社团活动，并被选为学生代表大会的1946级级代表。

我参加读书会学习邓初民的《社会发展史》，看了许多苏联小说，对共产党领导的苏联很向往。看了《冀东行》对解放区的描述，民青也经常秘密传看手抄的新华社通讯，逐渐把自己的信仰和党联系在一起。

由于我在学校中很活跃，干革命很积极，1948年1月程法毅找我谈话，并秘密给我看手抄的党章，问我愿不愿参加地下共产党。我当时已把自己的命运和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斗争结合在一起，很自然就积

## □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极写自传、写申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潘梁是我们的党小组长，他给了我一个任务。当时各大学的地下党有两个系统：一个是从昆明来的、由南方局领导的组织，叫南系；一个是由晋察冀城工部领导的组织，叫北系。为了防止敌人破坏，复员后两个组织没有合并。为了在学运中协调一致，为了发展党员时不要重复，需要设立联络员。清华地下党联络员原来是潘梁和彭珮云，当时改为我和郑存祚。这样，我就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了，由潘梁单线联系。

入党后对我最深刻的一次教育是1948年暑假，党组织派我去解放区泊镇学习了一个多月。我写过《永生难忘的一课》，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去泊镇路上，我们就受到一次国统区与解放区鲜明对比的教育。接头暗号是：陈池；地点：泊镇建设公司。

在泊镇的学习内容分三个阶段：一、汇报学运情况，社团情况。根据解放前夕敌人会加紧迫害的形势，要提高斗争的合法性，提出重视班、级、系的工作。二、学习《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学习荣高棠和刘仁同志关于北平形势和地下党的任务的报告。三、学整风文献、烈士传，三查：查阶级、查斗志、查纪律性。学习的收获主要有：了解全国形势，解放军已转入大反攻，全国解放在望。毛主席说：学运是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感到非常光荣又责任重大。临近解放，敌人会疯狂镇压。要减少公开大活动，深入做群众工作，保存和壮大革命力量，迎接解放。

学习结束，我们在沧县看了三天华北大学文工团的演出，很震惊也很受教育。

从泊镇回来后，我才知道8月19日，

国民党包围各大学，按黑名单抓人。上黑名单的许多地下党员都撤到解放区，党组织只能进行大调整，派我担任地下党北系总支委员。总支书记是胡聚长，委员是于志祥、赵斌和我。

这时，解放军已在全国进行反攻，平津解放在即，我们按照在泊镇学习的方针，减少大的公开活动，深入做群众工作，发展党和盟的力量，并发动教职工、学生抵制国民党组织学校南迁的阴谋。还组织党员、盟员秘密绘制北京市地图，详细到主干街道每个商户和机关单位的名称。

清华和燕京是1948年12月15日解放的，地下党派庞文弟同志去青龙桥和荣高棠工作组取得联系，后来开展了和解放军的多次联欢活动。

元旦过后，我又被安排组织代表团去石家庄参加华北学代会，清华有我和邵敏、黄祖民，燕京有谢道渊等2人，北大农学院1人。我们是坐马车去的，在涿县受到彭真、叶剑英同志接见，在正定受到华北大学接待。在石家庄开了半个多月的会，由华北团委书记陆平领导。直到1949年1月底，解放军入城那天，我们才随董必武、薄一波同志的车队回到北平。

北平解放后，清华进行了盟公开、党公开。南北系党组织合并，成立了校中共总支委员会，彭珮云任书记，我任青年委员。1949年3月20日，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我任书记，盟员500多人全转为团员。

### 解放后的工作

解放后，1949年9月至1962年，我在北京团市委工作了13年，担任过大学工作委员会第二副书记、宣传部副部长，市

团校教育长、青工部长。这是我的青年时期，青年团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我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得到培养锻炼，终身受益。

1962年，团市委书记杨伯箴调北京师院（现首都师范大学）任校长，把我也调师院附中（现名首师大附中），任副校长，在附中工作了16年。这个学校是百年名校，但我去的这段时间，政治运动不断，到校两年就随书记到香山慈幼园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当工作组组员。很快，“文革”开始，我们被揪回学校，批斗靠边站。师院附中的学生大多是公主坟几个军事大院干部的子弟，他们是海淀红卫兵的核心，热衷于上天安门当警卫和去社会上造反，没在学校里大闹。我们几个“走资派”在学校工友监督下劳动，实际上受到保护，没有受大罪，我还学会了烧锅炉、摇煤球、蹬三轮，锻炼了身体。当然思想上的压力就不用说了。

“文革”结束，1978年我调到北京工业大学，做过科研处副处长、处长、副校长，1986年起任校长6年，1992年退下。

在北工大，我主要干过三件事：

一是恢复、整顿被“文革”破坏的实验室，开足教学大纲要求的全部实验。引进了IBM4381大型计算机（当时水平较高），建设微型计算机实验室。还接受世界银行贷款，购置了许多进口仪器设备。

二是在老校长樊恭恂领导下，开展学校管理体制的改革。运用思想工作和物质激励两种手段，实行岗位责任、岗位考核、浮动岗位津贴三位一体的责任制，大大调动了教职工积极性，推动全校工作大步前进。这个改革，受到教育部支持，曾开会向全国推广，并有数百所兄弟高校前来观摩。

三是开创了产学研、技工贸结合的单

板计算机研发、制造、推销的校办企业。我们在国外单板机基础上开发了有自主知识产权、中国特色的TP系列单板机。当时全国计算机刚起步，进口计算机很贵，单板计算机价廉实用，用来教学很直观，用来控制生产很方便。我们还在销售的同时办学习班，讲计算机原理和常识。有1000多个高校和企业买我们的单板机，有3000多人受到培训。这项工作受到电子部重视和支持，和我校联合成立了微型计算机研究应用中心，并联合举办单板机夏令营，请当时任职电子部的李鹏、江泽民主持开幕式。我们的单板机还参加了历年香港国际电脑展览。在香港注册设立广元公司，负责采购元器件，搞外销；在蛇口设广华公司搞研发；在校内设电子厂做生产、推销基地。这个项目不仅推动了北工大和全国高校、企业普及计算机的教学和应用，还为北工大创收，支持学校改革中发放的岗位津贴，支持添置重要实验设备。

## 在全国政协当委员

1993年我已65岁，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科教文卫体委员会委员，连续当了第八、九两届，2003年退下。这十年中，我和教育界委员一起，主要干了两件事。

**教育投入问题。**1993年我写了《贫困的教育出路何在？》在《中国教育报》《北京日报》发表，教育报刊纷纷转载，最后收入《新华月报》。我在文中引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阐述了我国是用占世界1.18%的教育经费培养了占世界18.45%的学生，是用占世界0.78%的教育经费培养着占世界19.81%的中、小学生。真是“穷国办大教育”，教育经费怎么能不紧张呢？



## □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那时，政协委员们年年都呼吁解决拖欠教师工资，解决中小学危房，为中小学配置教学设备，尤其是农村和边远地区。我们做了许多调查，向政府反映。

1993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布《中国教育和发展的纲要》，提出在20世纪末，即2000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要达到4%。而这一时期在国家GDP飞速增长过程中，这个比例反而年年下降。1991年是3.05%，1992年是2.99%，1993年是2.76%，1994年是2.68%，我们真是心急如焚。在1996年八届四次会议上，李鹏总理、李岚清副总理参加教育界联组会；1997年八届五次会上，李瑞环主席参加文化教育界联组会，我都代表小组发言，呼吁提高教育投入。这些发言都反映在会议简报中。由于我总是呼吁增加教育投入，委员们给我起了个绰号叫“王投入”。

很欣慰的是，经过历届委员的呼吁，终于在上届政府的最后一年，2012年实现了4%的指标，我们也不再听到拖欠教师工资和校舍倒塌的呼声了。

**地方办高校和发展职业教育问题。**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经济困难，高等学校规模被严格控制。企业和行业办的高等专科学校，由于企业改制，和教育摘钩，在萎缩减少。但乡镇企业的崛起和沿海经济的发展又急需技术人才，因此，沿海地区办地方高校的积极性很高。而且普通高校重理论轻实践，培养出的学术性人才对地方又不适用。

我们在政协教育界组长王明达同志（原来主管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的国家教委副主任）带领下，作了深入调研，提了许多建议，我曾写了《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技术教育》《高等教育要重视“乡土人

才”的培养》等发言材料，得到李岚清副总理的批示，他还亲自带队去南方城市调查，让我一起参加。并指示国家教委组团，让我带队去美国考察“社区学院”。

清华大学有位优秀教授傅正泰，他深感许多优秀青年上大学无门，下决心创办了一所民办大学——海淀走读大学，得到周围老大学的支持，许多教授去兼课，许多大学提供实验室和体育设施。他改变传统大学的思路，调查社会需求，创办了许多职业性专业，如秘书、实验员、餐饮管理、导游等专业，学生就业情况比普通高校还好。海淀区政府也很支持，批复了用地，利用银行贷款盖了教学楼。但就是这样一所社会很欢迎的学校，因为生均校舍面积不达标，没有400米跑道的操场，被上级教育部门亮了黄牌，限制招生。而民办学校生源就是财源，学校有被亮红牌、被停办的危险。我们政协委员都感到不公。我写信给李岚清副总理，汇报了学校情况，请他去视察。他带着国家教委和北京市领导去了学校，听傅校长汇报，认为这是充分利用社会资源的好路子，要求继续办好。这个学校已走过二十余年办学历程，已成为有两万多学生的民办高校，现名北京城市学院。该校现任校长刘林，选上了十八大代表，是民办高校中的唯一代表。

在当政协委员时期，我还和国家教委，北京、江苏、陕西、上海教委的一些老同志们，承担了国家教委“九五”规划重点研究课题“高等教育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问题研究”。1997年5月开题，经过三年多调研，召开多次研讨会，于2001年结题，出版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一书。我作为课题组长撰写了结题报告。书中登载

了我在全国主要教育报刊上发表的9篇论文。我还和北京市教委和市属院校老同志们承担了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研究课题“面向21世纪北京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战略研究”。我担任课题组长，1996年10月开题，2000年底结束，最后出了论文专集。

回顾一生，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总算为人民做了些好事。一生中当然有坎坷，但我始终相信党、相信国家总会纠正自己的失误，走上正确的道路，因此绝不气馁。应该说，改革开放以后，是我最幸福的时期，尤其参加两届政协，通过例行视察和专题调研，跑遍了全国除西藏以外的各省、市、自治区，既听到工地隆隆的机器声，也听了坐在土坯上学习的农村儿童朗朗的读书声。我深深感到我国改革、发展的艰巨性、复杂性，大大开阔了眼界。

在政协，还交了许多好朋友，收获很大。蒋南翔校长号召清华人要健康地为祖国工作五十年，我是超额完成任务的。

现在，我垂垂老矣，但过着幸福的晚年生活。我坚持上网、上微信，和老校友、亲友们交往，关心国家大事，为祖国每项成就欢欣鼓舞。最近，在子孙精心照顾下，我们去粤港澳大湾区一游。80年代在北工大，90年代在全国政协，我多次到过广东沿海，这次是二十多年后旧地重游，看到翻天覆地的变化，真是感慨万千。我现在坚持游泳锻炼，争取健康地多活些日子。

最后，祝愿母校为国家培养更多的世界级英才，创造更多领先世界的科技成果。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帮助全国人民实现自己的梦想，引领世界走向和平、幸福。

2019年5月4日

## 与祖国相关的两个口号，我做到了！

○江欢成（1963届土木）

我是一名结构工程师，一辈子都在和土木工程打交道。记得当年我在清华大学读书时，有两个口号很响亮很深入人心，一个是“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一个是“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

时至今日，我总算可以说，我做到了！

这些年来，我一直奔走在建筑一线，致力于土木工程结构的创新与实践，设计、建造了很多建筑，见证了城市的蓬勃发展。因为主持设计“东方明珠”电视塔，我获得了建国六十年建筑创作大奖，这也是自己“摆得上台面”的一件事。

### 1978年获第一次全国科学大会奖

1957年，我从广东梅州中学考进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工民建专业。毕业分配时，我们班很多同学都填报了最艰苦的地方。我填报的志愿是洛阳、包头、兰州，但最终被分配到了上海。

1963年2月，我到上海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报到，徐汇煤球厂是我做的第一个工程设计，当时我把豪式屋架的五根腹杆减少为一根。我参与的第四个设计项目是虹桥机场指挥塔楼，在1964年。当时8层